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东

“一带一路”战略为中阿关系发展增添活力

杨福昌

摘 要：本文对历经六十年的中阿关系进行了回顾，政治上双方相互支持，维护权利，经济上优势互补，合作共赢。2010年底中东发生动荡后，中国一直密切关注，希望阿拉伯国家早日结束动乱、恢复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拉伯国家会增加对中国尊重国家主权独立、坚持不干涉内政、主张政治解决争端立场的理解，会越来越体会到中国是可以信赖、可以交往的国家。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阿关系将茁壮成长。

关键词：中阿关系；“一带一路”战略；中东剧变；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杨福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顾问，高级研究员（北京 100081）。

文章编号：1673-5161（2014）03-0004-12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尼时，分别提出了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2014年1月，习主席会见海合会代表团时，提出与包括海合会国家在内的西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就意味着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包括中亚、西亚、东南亚的众多国家，人口超过30亿，从经济角度讲，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不但参与者受惠，也会对地区 and 全球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对中国来讲，这一构想是中国实现全方位开放的新布局，东西兼顾，两翼齐飞，也是她经常强调的“互利共赢”政策的体现。

阿拉伯国家是西亚的主体，四亿人口，2.7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蕴藏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在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都占有一定地位；历史上这一

贾拉勒：“中阿合作论坛的成就、挑战与前景”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2期，第3-15页。

地区就是丝绸之路的通达之地，“一带一路”的汇合点正是在阿拉伯地区，相信他们在共建中定能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有近六十年的友好合作关系，为双方所珍惜，笔者经历了一些事件，兹分三个阶段做点回顾，希望有助增加对中阿关系的了解。

万隆会议 中阿初握手

新中国成立后，同阿拉伯国家初次官方接触发生于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1955年4月15日，在赴万隆途中早一日抵达缅甸的周恩来总理同缅甸吴努总理去机场迎接埃及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理，这是中埃两国领导人的首次见面，两人握手时周总理说了一句：“总理阁下，想不到你是那么年轻。”一次握手、一句话，象征着中阿双边关系的开启。有29个国家出席万隆会议，阿拉伯国家有9个，除埃及外，还有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利比亚、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也门。在会议上，周总理对埃及为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而进行的斗争表示支持，还表示“中国人民完全同情和充分支持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人民为自决和独立的斗争、阿拉伯人民在巴勒斯坦所进行的人权斗争。”充分体现了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反帝、反殖斗争的支持。那时新中国刚成立，美苏两大集团处于冷战时期，西方对中国封锁打压，丑化中国形象，在万隆，中国几乎成了会议的焦点，疑惑、不解、甚至攻击之词都指向中国，是周总理力挽狂澜，扭转了会议局面，并邀请与会代表到中国去看一看，以了解真相。

纳赛尔返国后，于1955年5月，即会议闭幕的次月，派其宗教事务部长艾哈迈德·巴库里访华，双方签署了《中埃两国文化合作会谈纪要》，“纪要”包括互派老师和留学生、文化艺术代表团互访、交换电影等文化交流内容。同年8月，埃及工商部长穆罕默德·阿布·努赛尔访华，双方签订了贸易协议和执行协议的议定书，除明确了具体商品外，还规定双方互在对方设立“商务代表处”，经双方换文确认，“代表处”有权悬挂国旗、国徽，正、副代表人身不可侵犯，公文、档案不受侵犯和有权使用密码。这些规定赋予了“代表处”一定的外交往遇。

根据“纪要”，中国决定派一位老师和七名学生去埃及，学生分别来自北京

陈敦德：《探路在1964：周恩来飞往非洲》，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页。

大学两位、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一位、外贸学院（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两位、留苏预备部两位。我那时在外贸学院学习，有幸成为七名学生中的一员。1955年9月刚开始二年级的课程，系领导即通知我去埃及。11月，我们办完一切手续准备出发时，突然接到通知，周总理要接见我们，总理是我们十分崇敬的人，他日理万机，还要抽出时间见我们，是从未想到的事，又高兴又紧张。到现场，看到参加会见的有外交部、外贸部、教育部、文化部、伊斯兰教协会、新华社等部门负责同志。总理同我们一一握手、询问每个人的情况，轻松的开局缓解了我们心中的紧张。总理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你们要刻苦努力学好它的（埃及）语言和文化，要谦虚谨慎，不卑不亢。阿拉伯国家和人民对新中国不大了解，他们是通过你们的言行、表现来看待中国的。因此你们不单单以个人身份去埃及留学，而是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出现在埃及，你们一定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总理的一番教诲是我们在埃的行为准则。此外，总理还对一些具体问题作了指示：（1）当知道学生中没有穆斯林时，他觉得很不妥当，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国外反动派造谣说，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尤其对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更为‘残酷’。这当然是造谣污蔑了。然而在派往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第一批留学生和教师中，却连一个穆斯林都没有，这样就给了国外敌人一个机会和借口，对新中国进行恶意的攻击和中伤。”总理指示要更换两位穆斯林学生去。教育部的同志说，去香港的车票已买好、行李已运走，是否下一批再派。总理说，车票可以退，行李可以追回，第一批学生中就要有穆斯林同学。就这样，留苏预备部的两位同学被换下，改为也是该部的一位穆斯林同学和一位北京回民学院（高中）55届毕业生、留校任学生会主席的同学。（2）当总理发现来自山东的老师讲话地方音太重时，他要求改派一位讲普通话好的老师去，因为是去教外国人讲中文，发音一定要准。后来改为西北大学的金家祯老师去。（3）当总理知道已定老师和同学们先走时，他觉得不安全，因为国民党在开罗有大使馆，老师和同学们遇到问题同国内联系不方便（之前曾通过印度驻开罗大使馆同北京联系），他要求商务代表处加紧筹备，和师生们一起赴埃。（4）他问在场的外贸部长叶季壮，代表处的班子组织得怎样了。叶答，还没有找到一个有点外事经验的人。总理当即指着在场的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张越说，张越去。接见将

李振中：《尼罗河畔的回忆：新中国第一批留埃学生纪实》，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66页。

李振中：《尼罗河畔的回忆：新中国第一批留埃学生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页。

结束时，张越请示总理：如果我们遇到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所谓外交人员，我们应当如何表示呢？总理坚定地说：告诉他们要热爱祖国，要给自己留后路。张越是商代处的副代表，正代表是外贸部的李应吉。

当商务代表处筹备就绪、准备和师生们出发时，12月23日周总理又接见了两批人员，教育部同志把金老师和两位穆斯林同学介绍给总理，总理亲切地让老师坐在他旁边，问了一下他的年龄，金老师说他今年56岁，总理说那我们是同龄人。又是一个轻松的开局。总理对同学们作了进一步的指示，主要内容是：到埃及后要好好学习，掌握真本领，将来为中埃两国人民的友谊架起广阔结实的桥梁；要多交朋友，与埃及青年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青年交朋友，沟通思想，沟通感情，将来世界是属于你们年轻一代的，亚非国家都面临反帝反殖的斗争任务，也面临着发展本国民族经济和文化的任务，完成这些任务要靠你们年轻人：要严格要求自己，有困难要尽量自己克服和解决，不要给埃及政府、教育部和大学增加麻烦，要遵守当地各种规章制度，要客随主便。总理的指示比第一次更具体、要求更严格、看得更宽更远。因为我是学生，所以把总理对我们说的话写得多一些，实际上，在第二次接见时他对商务代表处同志谈得更多，对他们工作的指示也非常具体，从埃及的重要地位谈到商代处的任务，以及我们的政策和应注意的问题等，都交代得很清楚。

我们就是一批留学生，出国前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两次接见，不但现在不可想象，就是在当时可能也是没有过的。总理这样重视这批留学生同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也是他对外交大局的运筹。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还很少，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少数周边友好邻国；另一方面，反华的声音却很高，特别是1950年发生的朝鲜战争，中朝交战的对手除南朝鲜外，还有打着联合国旗号的联军，中国受到国际上巨大的压力，中国需要对外交往，打开局面。总理出席万隆会议就是重要的一步棋，巴库里访华、派老师和留学生赴埃，是万隆会议这步棋的继续，发展与埃及的关系，也就为中国开拓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关系开辟了一个通道，故总理十分重视驻埃商代处和留学生的的工作。造化弄人，我们这颗小棋子，被摆在了一个大棋盘上。

我们1955年12月24日出发，经香港、卡拉奇（等签证），于1956年1月14日抵达开罗，开始了学习生活。

张越：《周总理派我出使非洲》，

参见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7619/7647/2541128.html>。

李振中：《尼罗河畔的回忆：新中国第一批留埃学生纪实》，第72页。

全面建交 友好关系深

自 1956 年 5 月 30 日中国同埃及建交始,至 1990 年 7 月 21 日同沙特建交,完成了同阿盟所有 22 个成员国建交过程。

历经近六十年的中阿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基础上,一直友好、顺利地发展,友谊不断加深,合作持续加强,这种良好关系表现在:

(一) 相互支持对方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帝、反殖运动风起云涌,中阿双方相互支持。周总理在万隆会议提出著名的“求同存异”主张,对亚非国家来说,最大之同就是这些国家几乎都曾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夺,在反帝、反殖大前提一致的情况下,互相理解与合作,摒弃次要的矛盾,是完全合乎情理,也是能做到的。因此这一主张被认为是扭转会议方向、使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理论。实践中,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阵线 1954 年 11 月举行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时隔不到半年,周总理就在万隆会议上表示了支持,之后通过第三国向阿提供军事援助。1958 年 9 月,阿在开罗成立临时政府,中国很快予以承认,是第一个承认阿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1956 年 7 月 26 日,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10 月底,英、法、以三国入侵埃及。中国除强烈谴责侵略、支持埃及的正义事业外,周总理还于 11 月 10 日致电纳赛尔总统,表示坚定不移地站在埃及一边,为此,“中国政府决定以 2000 万瑞士法郎的现金无偿地送给埃及”,中国红十字会也向埃红新月会捐款 10 万人民币,购买医药物资。

(二) 双方都尊重并支持对方关切的问题。

对中国来说,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反对台湾独立是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阿方对中国这一关切表示支持,在中阿合作论坛(以下简称“论坛”)2004 年成立宣言中明确提到,“阿拉伯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个问题在以后的历届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均有提及,在 2010 年举行的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公报中提到:“阿拉伯国家强调支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台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和平统一大业”。对阿方来说,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一切问题的核心,因为它不是一国的问题,而是牵涉到整个阿拉伯世界、甚至所有伊斯兰国家。中国一直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万隆会议期间,在周

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91 页。

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第 305 页。

总理坚持下，巴勒斯坦问题列入议程，并做出了阿拉伯国家满意的决议。1965年3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舒凯里访华，双方同意巴在华设立办事处（后升格为大使馆）。中国支持巴事业的立场不是偏袒，而是因为巴的土地仍被占领、众多巴人民沦为难民、建国的愿望未能实现，合法的民族权利未恢复，道理在巴勒斯坦一方。2010年5月，中阿双方在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公报中表示，支持建立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恢复阿拉伯合法权利，彻底结束以色列1967年以来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在中东实现全面、公正、持久的和平。根据新形势，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5月6日在北京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会谈时，提出中方关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维护了巴方权利，推动问题的和平解决。

（三）对许多国际问题双方有相同或近似的立场。

中阿都是发展中国家，有强烈的维护民族权利和尊严的意识，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坚决反对。2004年，美国提出大中东民主改革计划后，遭到阿拉伯国家朝野一片批评声和痛骂，迫使美不得不将其下架（哪怕是暂时的），即为一例。在2004年论坛成立宣言中，双方对国际问题作了如下表述：“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强调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并应根据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及联合国决议，支持各国人民在其全部领土上获得自由、独立和主权的权利。”这是双方当时对国际问题的共识，可以读出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含义。

（四）双方经贸合作不断发展。

双方经贸合作涉及多方面，如贸易、工程承包、劳务派遣、投资等，都保持增长势头。以贸易为例，双方贸易额不断上升，1979年仅为7.89亿美元，1989年为21.29亿，十年提升了近两倍。1997年为92.3亿，接近100亿大关。2003年为254.3亿，至2013年，达到2388.62亿，十年增长了近九倍。中阿产业结构不同，互补性强，特别是在能源方面，中国自1993年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后，因经济发展，能源需求年年增长，中东是重要来源地。2003年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石油973.69万吨，十年后，至2013年，中国从那里进口石油达13308.39万吨，增长了十余倍，占我当年进口石油总量的47.2%。从金额看，中阿贸易中，非石油产品还是超过石油产品，“中国制造”受到阿拉伯国家欢迎。

进入21世纪，国际形势发生了复杂变化。2001年“9·11”事件后，反恐成为全世界重要议题，美国发动了攻打阿富汗的战争；然后又毫无理由地入

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第276页。

侵伊拉克，把一个主权国家打得稀巴烂，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又派无人机去巴基斯坦轰炸，导致无辜平民伤亡。反对恐怖主义已成全球共识，也只有各国合作，才能取得成效，但一些西方国家在反恐斗争中把矛头指向伊斯兰教，阿拉伯国家遭到一些不公正对待。在这种状况下，中国为主持正义、体现中阿长期的友好关系，采取了三项措施：(1) 2001 年 12 月，成立了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表达了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持；(2) 2002 年，设立中东问题特使，为解决困扰本地区半个多世纪的阿以冲突再尽自己一份力；(3) 2004 年，成立了中阿合作论坛，为双方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接触、交流平台。

令人欣慰的是，论坛成立后并未成为一纸空文，束之高阁，而是在这一框架下，中阿双方为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从官方讲，成立了部长级会议机制，每两年举行一次，除探讨加强双边关系的途径外，还就双方关心的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每届部长级会议都为未来两年双方关系发展做出行动计划。双方的高官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负责落实部长会议的决定和决议并筹备下一届部长级例会。从民间角度看，更是机制众多：企业家大会、中阿投资研讨会、中阿农产品贸易和农业合作研讨会、能源合作大会等，属经贸方面合作；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高教与科研研讨会、语言与文化交流研讨会、双方每年轮流互派艺术团体互访等，属文化方面合作；另外，在新闻和环保等方面都有合作，规模较大的中阿友好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已形成机制。

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每两年举行一次，至今已举行了五次，第一次于 2005 年在中国北京举行，以后分别在沙特、突尼斯、阿联酋、中国新疆举行。笔者参加了这五次会，愿介绍一点情况。

问题的缘起是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有西方学者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引起学术界争议。各种文明之间确有不同，但并不必然要引起冲突，相反，不同文明间的合作、交流、相互促进的例子倒是不少。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往往并不能归咎于文明因素，而是政治原因，如美国入侵伊拉克战争，远谈不上什么文明冲突，美并未想在伊以基督教取代伊斯兰教。另外，往往同一文明的国家也会起冲突，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两伊战争，同为伊斯兰国家，并且都是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打了八年的仗，也只能从政治上寻找原因。“9·11”后，又有人把这一恐怖事件同伊斯兰教挂钩，同“文明冲突”挂钩。中阿都主张不同文明间要进行对话，而不是起冲突，成立文明对话机制，双方有机会在理论上共同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个文明的形成及发展同一个民族的历史背景、生产水平、和特定的社会生态等因素密不可分。一种文明历经沧桑变化及众多磨砺而不衰，定有其济世

醒人之处。中阿文明历史悠久，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阿占据其三，即中国、埃及、伊拉克，足见中阿文明底蕴深厚。双方对文明对话研讨会都很重视，在五次会议上都派出知名专家学者，他们精心准备，提交了高水平论文，保证了会议成功。会议举办国对会议也很重视，2007年，在沙特举行第二届会议时，阿卜杜拉国王及王储会见了与会的全体人员，热情赞扬中阿关系。这一举动是对会议、也是对这一机制的很大支持。

双方一致认为：中阿两大文明的交往源远流长，双方相互尊重，取长补短，为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新形势下，双方均倡导宽容、和谐与合作的精神，主张维护文化多样性，强调充分理解和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特性和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进行积极而富有成果的中阿文明对话，有利于巩固中阿传统友谊，深化中阿各领域合作，维护文明多样性，推动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建立更加公正和人道的国际秩序。

中方除同意上述内容外，还强调，**首先要承认文明的多样性是客观现实**，正是这种多样性才使世界多姿多彩、不断前进；**其次，要承认各种文明都是平等的**，没有谁上谁下之分，对一种文明的不尊重，也是对一个民族及其历史的不尊重；**第三，不同文明间要相互交流与借鉴**，而不是排斥和敌视，世界才会更美好；**第四，不能把恐怖主义同特定的民族和宗教联系起来**。在2007年第二届会议期间，阿卜杜拉国王接见出席会议人员时，我代表中国代表团向他谈了上述中国的观点，得到赞许，第二天沙特报纸全文刊登了我的讲话。

中东动荡 中国巧应对

自从2010年底中东发生动荡后，中国一直密切关注，希望阿拉伯国家早日结束动乱、恢复稳定。

中国对中东动荡中国家的政策是：（1）中国尊重人民的合法诉求和要求改革的愿望；劝和促谈，希望当事双方，政府和反对派，坐下来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反对诉诸武力，避免流血。（2）中国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主要是尊重各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根据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反对外来干涉，反对动不动就搞什么“政权更迭”，干涉会使问题更难解决。（3）中国执

参见《“中阿合作论坛”第三届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最终报告>》（2009年5月11-12日，突尼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亚非司编：《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文件汇编（2004年9月—2010年5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116页。

行的是和平外交政策,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希望国际社会也朝此努力,反对支一派、打一派,也反对动辄施加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

根据上述政策,中国从未以对某些前领导人的好恶,而在动荡中支持某人、反对某人;更没有向冲突中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激化矛盾;也没有不顾他国主权,妄自指责某某领导人已失去合法性,有没有合法性问题应该是由本国人民决定,中国始终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他对国家的命运、前途有最终发言权,外界不应说三道四。有人对中国没有支持人民推翻本国领导人,表示不满,认为没有支持人民“革命”。2011~2012年,安理会讨论叙利亚问题时,中国投了三次反对票,令一些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合会国家不理解,做出各种解读。中国除做出外交努力以消除一些误解外,学界也同阿拉伯国家的媒体和学界人士进行了广泛交流、沟通。设于上海的中阿合作论坛研究中心于2012、2013连续两年组团访问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合会国家,听取阿方意见,解释中方立场。代表团由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授组成,笔者作为该研究中心的顾问,随团出访。代表团除同各国学者、媒体交流外,还接受了“半岛电视台”和“阿拉伯电视台”的采访,介绍了中国政策,解释了投反对票的立场,也同阿方就不同观点进行交流。现将阿方的一些关注及代表团的应对做一简单介绍:

(一) 中国没有担心“阿拉伯之春”蔓延到中国。

阿拉伯学者提出,中国对阿拉伯“革命”态度不积极是担心“革命”蔓延到中国。我们向他们解释,双方政体不同,没有可比性,中国对此并无担心。引发阿拉伯国家动荡的某些原因在中国也存在,例如,腐败问题,人民对之深恶痛绝;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从2003年开始的十年中都超过0.473,越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另外,也存在物价上涨、就业等问题。所不同的是,中国领导人对这些问题完全掌握,并设法予以解决,改革开放政策已实行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提高,有目共睹;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已有20多名省部级官员因贪腐被查处,反腐力度之高令世界瞩目;对存在的社会问题主要通过改革予以解决,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0.473:我国基尼系数高于国际警戒线》,载《每日经济新闻》2014年1月21日,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4-01-21/804845.html>。

《高官接连“落马”,中共反腐马年再发力》,新华网,2014年2月1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2/19/c_119413120.htm。

会就进一步改革开放、改善人民生活做出了决定，代表团向阿方学者做了介绍，结论就是在阿拉伯世界发生的事不会蔓延到中国。

（二）中国不会放弃不干涉内政的政策。

有阿拉伯学者认为，今天的中国已非昔日可比，不应再被“不干涉内政”所约束，要在国际事务中多发挥作用，要用行动支持“阿拉伯之春”。我们向他们谈了中方观点，中国于1954年提出的不干涉内政原则，至今已六十年，仍坚持不渝，是因为这一原则有其合理性，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有法理依据；也有一贯性，过去、现在、将来中国都是、也都会这样做。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在实践上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为施加干涉者都是大国、强国、富国，反过来的例子没有。谈到这里时，有阿方学者同意我们意见说，例如莫桑比克，我们也补充，如毛里塔尼亚，像这样的小国绝不会干涉别国事务的，他们担心的是别人干涉他们的内政。访问阿曼时，谈到阿曼对中东形势的政策时，一位领导人对我们说：阿曼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不允许别人干涉我们的内政。我们当即表示，这同中国的表述是一样的。中国今后仍会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

（三）中国外交中国做主，不是跟着别人跑。

在两个海湾国家都有学者提出，为什么中国总是跟着大国跑，安理会在通过关于海湾危机的678号决议时，中国跟着美国跑，在安理会表决叙利亚问题提案时，又跟着俄罗斯跑。1990年8月因伊拉克侵占科威特而爆发海湾危机，我知道一些事情原委，向他们做了解释。在同年11月末安理会讨论678号决议草案时，美国向中国施加了巨大压力，要中国投赞成票，否则会影响到外长访美的安排。表决时，因为草案中有“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措辞，有悖中国一贯主张和平解决争端的立场，故不能投赞成票；另一方面，草案要求伊拉克立即从科威特撤军，中国又不能投反对票。最后中国投了弃权票，不能说跟着美国跑。至于安理会讨论叙利亚问题时投反对票，中国是根据自己尊重联合国宪章、坚持尊重国家独立主权及不干涉内政原则、吸取了利比亚问题的教训做出的，并不是跟着俄罗斯跑。在访问沙特期间，我们同《利雅得报》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之后，该报以“中国不支持叙现政权 投否决票是为了维护人民主权的原则”为标题，详细报道了这次座谈会，介绍了中方观点。

（四）中国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投反对票的。

阿方有学者和媒体人士认为，中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叙问题上投了反对票。中、阿双方的处境和政策取向不尽相同，采取的立场和行动不同是自然的。从利益角度讲，中国同海合会国家的利益远大于同叙利亚的利益。政治上，中国同叙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同海合会国家关系的内涵则高于同叙关系，目前

中国同四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海合会国家居其二，沙特和阿联酋，中国还同海合会建立了战略对话机制；经济上，中国 2011 年同海合会国家的贸易额达到 1337 亿美元，同叙仅为 24 亿美元，2012 年双方贸易额升为 1550 亿美元，同叙降至 12 亿美元，相差甚大。所以中国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投否决票，而是出于自己坚持的原则，因为决议中有“政权更迭”的提法，这是干涉一个国家内政的问题。如果说有利益考虑的话，中国希望各方都遵守不干涉内政原则，如能做到，则中国幸甚，世界幸甚。

结语

“一带一路”的构想提出只有几个月，同有关国家协商，制定出进一步计划和行动方案，均需时日，唯中阿间在此构想下的合作却可以走在前头，这是因为：

(1) 双方产业结构不同，互补性强。能源是阿国出口的支柱产业，中国是能源消耗大国，2013 年从阿国进口原油金额达 1046.06 亿美元，约占中阿贸易总额 2388.62 亿美元的一半，今后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会逐年增加；同样，中国的机械、纺织、通讯器材、轻工等产品都深受阿国人民的欢迎。埃及前驻华大使贾拉勒认为，阿拉伯国家“最缺乏的还是知识和技术”，需要中国帮助他们“发展民用工业和经济基础，实现中阿工业一体化。”只要双方做出努力，上面提到的问题都会有积极成果，因为今后 5 年，中国年均对外投资将达 1000 亿美元，进口 2 万亿美元商品，中方欢迎并支持阿拉伯国家在其中占有更多份额。

(2) 经历动荡的国家急需恢复建设，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年多的动荡给一些阿拉伯国家经济带来很大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需要恢复。这些国家正在做出努力克服面临的困难，作为友好国家，中国也尽自己的可能，提供一定帮助。2012 年，中国向埃及提供了为期三年的 4.5 亿元人民币的优惠贷款，在外资纷纷撤离埃及时，中国投资两亿多美元的玻璃纤维厂投入生产。中国知道埃及对发展苏伊士运河区寄予厚望，表示愿积极参与“苏伊士运河经济走廊”和“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一带一路”将促进资源要素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有序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中方提出了许多新领域，如希望加强中阿在铁路、公路、港口、民航、电信等领域合作，还表示愿同阿方探讨在和平利用

贾拉勒：“中阿合作论坛的成就、挑战与前景”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3-15 页。

外交部网站：“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方向”，

<http://www.fmprc.gov.cn/zalt/chn/zgsd/t1149445.htm>。

核能、卫星制造与发射等领域开展具体项目合作。如能在这些领域开展合作，肯定会提升阿方的经济水平，实现共赢。

(3) 阿方向东看，中方向西进，双方越走越近。贾拉勒大使在其文章中提出，“阿拉伯国家在投资上应‘向东看’，尤其要向中国看”；中国，特别是其西部地区，提出的口号是向西进，主要是指阿拉伯国家，双方的取向和目标是一致的。“一带一路”的构想完全适应双方的共同愿望，一经提出，受到阿方重视，相信一旦有具体方案提出，会得到中阿双方的积极响应。

半个多世纪的中阿友谊如参天大树，根基深厚，“一带一路”的构想又为这棵大树添加了营养剂，使它持续茁壮成长。

Invigorating Sino-Arab Relations by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YANG Fuchang

(Yang Fuchang, Adviser and Senior Researcher of China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Sino-Arab relations in the past six decades. Politically, the two sides support each other and safeguard their rights. Economically, the two sides hav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advance win-win cooperation. Since the Middle East Turmoil in the end of 2010, China always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situation in Arab countries and wishes the unrest in the Arab countries end soon and the stability be recovered. As time goes on, the Arab countries will increase their understandings to China’s position of respecting the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dependence, insisting on not to interfer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standing for the politica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They will come to learn that China is a reliable and contactable country. Under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Sino-Arab relations will thrive.

Key Words Sino-Arab Relations;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Middle East Turmoil; China’s Diplomacy

(责任编辑 张金平)

贾拉勒：“中阿合作论坛的成就、挑战与前景”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2期，第3-15页。